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学术研究指南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文化社会学指南

[美] 马克·D.雅各布斯 南希·韦斯·汉拉恩 编 刘佳林 译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本书涉及到艺术、科学

宗教、种族、阶级、性别

集体记忆、制度、公民身份等

基础性、热点性主题

覆盖了文化社会学领域的最重要的问题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学术研究指南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文化社会学指南

[美] 马克·D.雅各布斯 南希·韦斯·汉拉恩 编 刘佳林 译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社会学指南 / (美) 雅各布斯 (Jacobs, M. D.),
(美) 汉拉恩 (Hanrahan, N. W.) 编; 刘佳林译. — 南
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ISBN 978-7-305-08891-9

I. ①布… II. ①雅… ②汉… ③刘… III. ①文化社
会学—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972 号

Mark D. Jacobs & Nancy Weiss Hanrahan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first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6-286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文化社会学指南
编 者 [美] 马克·D. 雅各布斯 南希·韦斯·汉拉恩
译 者 刘佳林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编辑热线: 025-8359724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75 字数 59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891-9
定 价 5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

的发展,尽力揭集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S. 阿彻自 1979 年起一直是沃威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的兴趣始终集中于“结构与能动性问题”，并先后出版五部著作：《教育制度的社会起源》（1979），《文化与能动性》（1988），《现实主义社会理论：形态发生学方法》（1995），《为人：能动性问题》（2000），《结构、能动性与内在谈话》（2003）。她是国际社会学学会唯一一位女主席（1986—1990），是大社会科学学院的奠基人和校务委员。

艾伯特·J. 伯格森是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先后与安德鲁·M. 格里利合著《电影中的上帝》（2003），与伍思璐、亨特和库兹威尔合著《文化分析》（1984）。最近和即将发表的文化社会学论文包括：《迪尔凯姆的心理范畴理论：证据论》（《社会学年刊》，即出），《乔姆斯基与米德》（《社会学理论》，即出），《哥伦比亚杂文》（《美国行为科学家》，2002），《语言学模式的艺术史》（《诗学》，2000）。

丹尼尔·托马斯·库克是位于厄巴纳—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广告系助理教授，曾出版《童年的商业化》，探讨的是过去和现在的儿童消费者的兴起问题。他还编有《象征的童年》，是一个讨论儿童表征政治的原创研究简编。曾在《社会学季刊》、《消费者文化》和《童年》等杂志发表有关儿童与消费者文化的论文。

戴安娜·克兰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曾荣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是（纽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成员，贝拉乔研究会议中心（洛克菲勒基金，意大利贝拉乔）的访问学者，两次富布赖特基金会获得者。她是 1991—1992 年度美国社会学学会文化社会学部主席，曾发表论文及著作多篇（部），包括：《先锋的转换：纽约艺术世界，1940—1985》（1987），《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1992），《时尚及其社会事项：服饰中的阶级、性别与身份》（2000）。曾参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1994）和《全球文化：媒体、艺术、政策与全球化》（2002）。著作先后被译成中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和土耳其文。

蒂亚·德诺拉是埃克塞特大学音乐社会学教授。最近出版了《阿多诺之后：反思音乐社会学》，还曾出版《贝多芬与天才的建构》（1995）和《日常生活中的音乐》（2000），并在社会学及音乐学杂志发表多篇论文。《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和《纽约书评》曾评论她的研究成果。她还曾参与欧洲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研究网络的建设，是该学会前任主席。

米歇尔·狄龙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部主席。著作包括:《天主教徒身份:理性、信仰与权力的平衡》(1999),《离婚辩:爱尔兰的道德冲突》(1993),《宗教社会学手册》(2003),以及一些有关宗教、文化和生命进程的文章。

约翰·H.埃文斯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副教授,曾出版《戏弄上帝:人类基因工程与公共生物伦理讨论之合理化》(2002),并与伍思璐合编《上帝暗中之手:基于信仰的行动主义与主流清教徒的公共角色》(2002),还曾就美国有关离婚、同性恋等问题之两极分化的意见发表一系列文章。

南希·弗雷泽是新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亨利与路易斯·A.列奥布政治与哲学教授,曾参编《荟萃: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学刊》。她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斯宾诺沙哲学主席教授,2004—2005年柏林研究员。她的著作包括:与阿克塞尔·霍尼斯合著的《再分配或承认:政治—哲学的交锋》(2003)以及《正义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1997),与赛拉·本哈比勃、朱迪斯·巴特勒及德鲁西拉·康奈尔合著的《女性主义争论:哲学交锋》(1994),《难以驾驭的实践:当代社会理论中的权力、话语与性别》(1989)。弗雷泽教授曾荣获多种基金赞助,多次受邀进行学术演讲,并获得多种奖励,著作先后被译为法语、瑞典语、德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日语和中文。

福冈和也是佐治亚大学全球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和政治学博士生,曾在日本《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论文。

杰弗里·C.戈德法布是新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系迈克尔·E.盖勒特讲席教授,曾就文化社会学和政治学问题发表多部著作和文章,包括:《论文化自由:波兰与美国的公共生活研究》(1982),《公开以外:后极权思想》(1989),《怀疑的社会: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1991),《倒下之后:中欧的民主追求》(1992),《文明与颠覆: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1998)。

戴维·哈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勒鲁瓦·尼曼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他曾出版《洛杉矶与纽约:政治、社会与文化》(2003),《文化内部:美国家庭中的艺术与阶级》(1994),《美国工人:蓝领财产所有人的工作、家庭与政治》(1984),与路易斯·米尔合著的《权力记录:艺术家尼曼及1000名尼曼收藏者的社会学研究》(1991)。论文《观众对“轰动”的态度和大众对有争议艺术品的态度》收于《不安的轰动:布鲁克林美术馆之争对艺术政策的启发》(劳伦斯·罗思菲尔德编,2001)。

南希·韦斯·汉拉恩是乔治·梅森大学妇女研究情报中心主任,社会学副教授。在投身学术事业以前,她曾在纽约市从事音乐活动十年,做过电台播音员和音乐会制

作人。带着这种职业经验,她开始了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研究,曾出版《时间中的差异:批判性的文化理论》(2000),并有文章收入《批判理论:多样的客体,多样的主体》(2003)和《社会转型的反思》(2001)。

安托万·亨尼恩是巴黎矿业学校研究主任,曾任创新社会学中心主任。他是国际社会学学会艺术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法国多个科学委员会(巴黎音乐研究院、人种学遗产研究会、梅德里克—阿尔茨海默基金会)成员。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与他人合著的关于音乐爱好者的论著《业余爱好者形象》(2000),有关19世纪法国对巴赫的应用的著作《伟大的巴赫》(2000,与J.-M. 法尔格合著)和《音乐的调节作用》(即出),译著《音乐热情》(1993)。

马克·D. 雅各布斯是乔治·梅森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曾开创文化研究博士生项目,并担任主任七年,这是美国该领域第一个跨学科博士生项目。曾出版《强化制度,发挥效应:无责任社会的青少年司法问题》(1990),并在《行政与社会》和《艺术管理、法律与社会学刊》上发表文章。他曾为丹尼尔·库克编辑的《象征的童年》撰写章节《学校之为牺牲仪式》,与林恩·施皮尔曼合编《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学大众》特刊(第33卷),论题是《扩散的文化社会学:知识领域与制度边界》。1994—1998年间在国际社会学学会第37研究委员会执委会工作。曾在乔治·梅森大学参与组织美国社会学学会文化社会学部的两次国际会议,2000年以来一直是社会学部杂志《文化》的编辑。

罗纳德·N. 雅各布斯是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校区社会学教授。曾出版《种族、媒体与市民社会危机:从沃茨到罗德尼·金》(2000),并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理论》及《定性社会学》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他是《美国社会学杂志》顾问,国际社会学学会第16研究委员会(理论)执委会成员。

玛丽亚·基法拉斯是圣约瑟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曾出版《工人阶级英雄:保护芝加哥社区的家庭、社区与国家》(2003),并跟凯瑟琳·爱丁合著《我能践诺:为何贫困妇女重母性轻婚姻》(即出)。

卡林·诺尔·塞提那是康斯坦茨大学社会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比勒弗尔德大学世界社会研究学会成员。除三个学位外,她还有许多荣誉,包括维也纳大学杰出基金获得者、福特基金会博士后资格、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员、科学社会研究国际学会主席和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未来成员。曾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著作多部,包括:《认识文化:科学如何创造知识》(1999)。该书荣获科学社会研究会路德维克·弗莱克奖和美国社会学学会墨顿奖。

马加利·萨法提·拉森曾就职业、建筑社会学和政治文化撰写多部著作和论文。她的论文发表在四个国家的刊物上,著作《超越后现代假象》(1993)曾获美国建筑师学

会和美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部奖励。她是坦普尔大学荣休教授,并在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工作社会学任教,直到 2001 年辞职。她曾参与拉蒂诺社区的机构活动和各种进步政治活动。

奥维尔·李是新学院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生院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文化与政治领域,曾发表 6 篇文章,其中包括收入《荟萃》(1998)的《文化与民主理论:走向象征民主理论》,曾获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优秀论文奖。

保罗·利希特曼是南加州大学社会学及宗教学副教授,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公民组织、宗教及政治团体,还有文化理论及体验式观察方法论。他的第一部著作《寻找政治共同体》(1996)获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优秀著作竞赛提名奖,第二部著作《难以名状的一致:美国的宗教团体与公民参与》用常人方法论对宗教社区服务组织进行研究,涉及低收入人群、社会服务机构和其他公民组织。

简·马容泰特从事的是艺术与技术社会学研究。从 1998 年起,她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尔夫维尔的阿卡迪亚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本书收入的他的研究文章得到下列机构的支持: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研究会,工业加拿大,史密森研究会,国家美术馆(华盛顿地区),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商业、技术与社会史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创新社会学中心,慕尼黑博物馆,魁北克政府研究资助基金。

约翰·W. 莫尔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副教授,研究生部副主任。他的论文《士兵,母亲,流浪者与其他》获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优秀论文奖(1996);论文《政府干预非营利部门后的影响:新交易案例》(与弗兰采斯卡·格拉·皮尔逊合作),获 1997 年度非营利组织与自愿行动研究会杰出论文奖。他曾(与罗伯特·弗兰罗西合作)编辑《理论与社会》特刊,讨论的是“形式化的新方向与历史分析”专题;编辑《诗学》特刊,讨论的是“关系分析与制度意义:文化研究的形式模式”问题(2000)。他是罗马拉萨皮恩察大学的客座教授,是巴黎人类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他是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主席,与罗杰·弗里德兰一起在加州大学举办文化转向系列会议,并参编《文化事物:实践中的文化社会学》(与弗里德兰合作)。

安德烈亚·L. 普雷斯是位于厄巴纳—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研究员和社会学教授,同时负责媒体研究项目。她著有《看电视的妇女:美国电视经验中的性别、阶级与代系》,《谈流产:电视、妇女与权力话语》(与伊丽莎白·科尔合著),《新媒体环境中的媒体研究》(与布鲁斯·威廉斯合著,即出)。普雷斯教授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编辑了一套《女性主义研究与媒体文化》丛书,并(与威廉斯)编有《传播评论》。她曾获得丹福思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精神卫生学会的资助。

巴里·施瓦茨是佐治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他是1999—2000年度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主任,现供职于林肯二百周年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他是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国家人文中心、史密森学会、佐治亚大学人文中心和希伯来大学的成员,2000年荣获佐治亚大学欧文斯研究奖。他著述颇丰,先后出版5部作品,包括《华盛顿:美国象征的缔造者》(获理查德·纽斯塔德奖)。他的《林肯与国家记忆的铸造》(荣获2000年纽约林肯集团奖和纽约南北战争圆桌会议奖)梳理的是1865到1922年间林肯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第二卷《千年之际的林肯》研究的是大萧条时代到21世纪初的林肯形象。

苏珊·S.西尔比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她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会员,曾出版《寻常法律:日常生活中的故事》(1998,与帕特里夏·尤维克合著),获美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部表彰。与赫伯特·克里策合编《诉讼:富人还终将胜出吗?》,与奥斯丁·萨拉特合编《法律、政治与社会研究》(10—17卷)。曾担任《法律与社会评论》编辑,是法律与社会学会前任主席。

泷川石井幸子是日本横滨大学国际关系系社会学副教授。在日本期间,她曾参与在日本的韩国居民伦理意识问题的研究(2000—2002)和横滨市唐人街中国及日本居民的口述史项目(2003)。目前正撰写博士论文《面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朝圣:文化对日裔美国人关于拘留之集体记忆的重要性》。

安娜·利莎·托塔是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传播社会学副教授。她是瑞士卢加诺大学传播科学学院访问教授,参与创办欧洲社会学会艺术社会学研究网络并曾担任主席,是国际社会学会艺术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理事。1999—2001年期间曾担任意大利平等机会部“性别、代系与文化差异”委员会主席,卢加诺大学平等机会组织联合主席。著作包括:《艺术民族志:走向艺术语境社会学》(1997),《艺术社会学:从传统博物馆到多媒体艺术》(1999),《冲突的记忆:过去之社会传播研究》(2001,编),《受伤的城市:1980年8月2日博洛尼亚惨案的记忆与公共传播》(2003)。她还曾就艺术、集体记忆和性别问题用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许多手册及杂志发表论文40多篇。

罗宾·瓦格纳-帕西菲西是斯沃思默学院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部主任。著作包括:《投降的艺术:冲突后权威的瓦解》(即出),《僵局理论:行动中的偶然性》(2001,荣获2001年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优秀著作奖),《话语与解构:费城对MOVE》(1994),《摩罗道德剧:作为社会戏剧的恐怖主义》(1986)。他目前的研究项目包括《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臆断与摆脱的阈限事件》和跟安德鲁·佩林合作的《后现代选举危机中的时间、疆域与表征》。

L.弗兰克·韦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勒鲁瓦·尼曼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社会学讲师。他与莫里斯·蔡特林合写的论文《黑人与白人,联合与斗争?种族之间的工人阶级团结与种族雇佣平等》(刊于《美国社会学杂志》)获2002年度美国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部提名奖和杰出贡献奖。

布鲁斯·A. 威廉斯是位于厄巴纳—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城市与地区规划系教授,传播研究学院研究员。他出版了4部著作,并撰写了50多篇学术论文和章节。最近一部著作《民主,对话与环境争端:冲突的社会规范语言》(与艾伯特·马西尼合著,1996)获1996年度美国社会学会科学、技术与环境政治学部考德威尔优秀著作奖。他(与普雷斯一起)编有《传播评论》。

里斯·H. 威廉斯是辛辛纳提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曾参与撰写《架起信仰的桥梁:一个新英格兰城市的宗教与政治》(1992),编有《美国政治中的文化战争:大众神话评论》(1997)和《践诺者与新男性:私生活与公德》(2001)。此外,曾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理论与社会》、《宗教社会学》等杂志发表论文,著述曾两获学会“杰出论文奖”。他曾任美国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部主席,还参与编辑《社会问题》(1996—1999)并编辑《宗教科学研究》。

薇拉·L. 佐尔伯格著有《外来者的艺术:当代文化中的竞争性边界》(1997)和《建构艺术社会学》(1990),并被译为意大利语、韩语和西班牙语。曾与戴维·斯沃茨合编《象征权力社会学:论布尔迪厄》(2004)。她是美国社会学会文化部首任主席,国际社会学会艺术社会学研究会主席,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赞助的文化私人化项目联合主任三年,是ACLS会员,并获得多种荣誉。

致 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助理编辑特蕾西·麦克尤恩,感谢她在整个编辑期间慷慨有益的帮助。特蕾西是乔治·梅森大学文化研究博士生,她研究的是青年妇女抵制公共与私人空间中电视、视觉文化及社会互动所表现出的殖民活动问题。

目 录

Contents

001 / 作者简介

001 / 导 论

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问题

015 / 1 结构、文化与能动性

030 / 2 文化与认识

041 / 3 差异与文化系统:三个部分的不一致

第二部分 文化系统

055 / 4 全球知识社会中的文化:知识文化与认识文化

068 / 5 媒体文化与公共生活

082 / 6 “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吉尔兹以来的理论与实际进展

097 / 7 审美不确定:新标准?

112 / 8 鉴赏语用学

第三部分 日常生活与意义的建构

127 / 9 音乐与社会经验

138 / 10 消费者文化

152 / 11 名声与日常生活:真人秀节目中的“博彩名人”

163 / 12 为爱辛劳:有关单身母亲的阶级与文化反思

第四部分 身份与差异

177 / 13 阶级与文化的新发展

188 / 14 性与宗教:身份差异的协合

200 / 15 文化转向后的种族

第五部分 集体记忆与文化遗忘症

- 217 / 16 集体记忆:文化的重要性
- 234 / 17 恐怖的反记忆:突发事件的公共铭记
- 245 / 18 博物馆与文化构造
- 259 / 19 见证人的困境

第六部分 制度文化

- 271 / 20 作为规训性文化的职业
- 283 / 21 日常生活与合法性的建构
- 295 / 22 福利话语与福利改革
- 309 / 23 无责任社会的存贷丑闻文化

第七部分 地方、民族与全球性的公民文化

- 325 / 24 民间公民文化
 - 338 / 25 宗教信仰的公共语汇:美国公共领域中的显性与隐性宗教话语
 - 350 / 26 全球经济中的民主与全球化
 - 363 / 27 文化自治与小事政治的创立:重访 1968
 - 376 / 28 走向非文化的文化社会学:论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阶级与地位
- 389 / 索引

导 论

马克·D.雅各布斯与南希·韦斯·汉拉恩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转向”,“文化”也被重新阐释,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许多陈旧的文化理论遭到否定并被抛弃,包括帕森斯的观点。在帕森斯看来,文化是一个形成相对共识的标准与价值系统,是对其他亚行动系统进行评价的基础。文化转向的各色辩护者们对此及其他说法表示反对,为此他们有许多理由。帕森斯的理论强调客观结构的内化,这是对人的种种能动性的限制。它忽视了人的充分主体性,甚至还将地位差别范畴本质化。这种理论描绘的似乎是一个过于封闭的文化系统,无法适应迅速兴起的有关身份差异的界定或剧烈的社会变化的迫切需要。

文化转向以文化权威在当代社会的消散为前提,它秉持更为多样的文化观,承认社会与个人经验各有不同,并关心平等、宽容等价值观念。随着越来越多类型的人被视为文化行动者,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文化分析术语也相应地发生转变。文化不再主要是一个独特的或首要的信仰体系,而是某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生活经验的媒介。但是,文化转向也重新引发了过去文化理论似曾解决了的两个主要问题:如何在肯定差别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团结一致,如何在文化权威衰落时确立对行动进行规范性评价的基础。

布莱克威尔《文化社会学指南》力图既展示文化转向的前途,也勾勒超越文化转向的基本路径。总体而言,本书汇集的28篇原创性文章都是文化社会学的最新成果。《指南》首先关注文化转向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即能动性 with 结构、构成主义与本质主义、系统与差异的问题。接下去分别探讨作为文化系统的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意义构成过程的文化,作为集团身份与集体记忆核心的文化,作为激发各种制度及地方、民族与全球公民身份能量的文化之作用问题。这项研究涉及的实际课题范围非常广阔,因此在观念与方法上出现重大差别也很正常。但这些文章显然试图用新方法来解决文化转向引起的问题——重新对文化进行集中界定,开始通过承认差异来确立团结的基础,在缺少指定性文化权威的情况下确立评价的新基础。这一新兴文化观是一种美学的文化观,使加强并重新想象公民生活成为可能。

篇章概要

本书开篇部分探讨的是文化转向中的一些突出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后面也多有呼应。

造成文化系统转型或再生产的原因是什么?文化曾被视为“首要的原动力”或一

种附带现象,但一旦这种观点遭到否定之后,如何有效地构想文化的因果关系?玛格丽特·S.阿彻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化理论再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文化理论都把观念的文化系统与社会—文化互动合并在一起。阿彻认为,这些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各自独立的,由此她就可以预言:它们各自内部的变化会形成互动,从而逐渐影响不同的文化结果,是结构、文化、能动性之系统理论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阿彻就可以解释,为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始终存在派系冲突、始终没有达成意见的统一,尽管双方都同样关心要防止世俗理性变成现实。

文化与认识的关系是什么?就像布尔迪厄的惯习或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文化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个体可以内化呢,还是认识先于文化?艾伯特·J.伯格森主张激进的本质主义:心或脑生成文化,但我们又与可塑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紧密相连。在他看来,文化是一套图式,可以按无限多的方式组合,这很像语言中的生成语法,它提供图式性的规则,但允许无限变化。他将这种分析运用于艺术,认为风格的变化不是与各种美学惯例打交道的艺术家社会化的结果,而是“使我们能够根据有限的原始事物、规则和原则生产无限量的独特的艺术结构”之艺术官能的产物。社会学要进入艺术研究,其合适的方式是去关注促使某个历史阶段选择某个主导风格的那些社会权力。

文化差异被用于对普遍性范畴进行批判,比如主体的人或自主性个体,并被用于证明所谓文化中立的公共领域其实具有性别化、阶级化、种族化或性态化特征。因为文化差异涉及社会分层,它们也是提出社会矫正要求的经常性基础。但悖论由此出现:不断进行的差异表达并没有瓦解文化系统,而是在对文化系统进行再生产。为了超越这种“差异困境”,南希·韦斯·汉拉恩详细阐述了作为文化系统的性别模式,认为其中的差异在三个层面上并随着时间而发挥作用。这种模式的时间维度保证了诸差异在时间中展现的偶然性,但又不失系统性,这是文化及其分析的重要特征。她按照这种模式对作为政治策略的差异表达及其成功机会作了分析。

接下去的部分论述的是对文化系统的崭新理解。文化权威的消散对文化系统的影响结果是什么?文化系统如何重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仍指引着行动的方向?

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将如何改变文化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关系?卡林·诺尔·塞提那认为,在研究知识进程时,关于文化形式方面的探索很必要。“认识文化”与“知识文化”之于知识社会就如同过去的民族文化之于工业社会,它们描绘了支持或阻挠某些知识成果的整个知识环境的结构与政策,并描绘了建构知识背景的种种安排、进程和原则。

罗纳德·N.雅各布斯认为,社会学研究对一般利益及无党派新闻媒体的关注掩盖了媒体话语的另外一些形式,而后者对市民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他描绘了从新闻到娱乐、从一般利益到特殊利益、从无党派报道到鼓吹式报道的媒体内容图景,展示了这些不同类型的媒体彼此渗透进而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市民话语的方式。他通过对非裔美国读者报纸的研究表明,有着特殊受众和偏向的有表现力的媒介能够成为促进公民联合而不是分离的力量。

在吉尔兹关于宗教的那篇开创性论文发表35年之后,里斯·H.威廉斯对如何准确地理解“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作了探讨。宗教是适用于结构理论还是能动性理论?

它是隐性文化还是显性文化？是霸权性的还是反霸权性的？在威廉斯看来，不能再将宗教视为功能性的或是一种附带现象，他更愿意接受宗教本身即为主体的观点。在一个日渐复杂和多元的社会，一些特殊团体明确表达他们自身对宗教的解释，目的是提升自己，且通常都是出于政治抗议。

薇拉·L. 佐尔伯格勾勒了现代时期美学标准的演变及其在后现代阶段的明显瓦解。但在这看似直截了当的叙述之中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曾支撑这种标准的范畴及特征已经瓦解，如果现在更多的作品都被视为艺术，如果现在的艺术看门人形形色色、美学价值的评价标准也确实很多，那怎么还会有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在为艺术命名的文化权威已经瓦解的当下，我们要如何解释艺术在当代环境中的坚持？

安托万·亨尼恩对业余爱好者古怪的、似乎异常的习惯和特性做了研究，比如那个音乐爱好者，他知道他架子上每张唱片的位置，但其分类方式却无视理性范畴。布尔迪厄认为鉴赏趣味是一种分类系统，可以标示为其他的社会指标，亨尼恩质疑这样的说法，他分析了那些互动、方法、主体和客体，从而获得了鉴赏的具体形式。他认为，鉴赏是一种反身活动：通过这些手段，业余爱好者的特殊能力和其所珍视的全部作品都被生产出来。

下一部分考察的是意义的建构和日常生活中主体性的发展。在互动的潮流中，我们如何看待自身、构造自身？是通过我们对文化事物的控制，还是通过意义创造的进程？

蒂亚·德诺拉研究的是我们如何用音乐研究我们的情绪为工作作准备、让我们想起所爱的人或营造聚会、恋爱、购物的情境。在她看来，音乐不是结构——即不是作用于个体的东西——而是行动的源泉、自我生产的源泉，是感情状态、风格和互动的环境。针对认为音乐“反映、展望或在结构上类似于社会发展或认识风格”的观点，她提出了审美能动性的说法，认为物质文化在塑造主体性方面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物质文化也是丹尼尔·托马斯·库克研究的一个要素，他关注的是童年的商品化问题。宝宝秀是将儿童作为消费主体来期待和塑造的——甚至在儿童出生前。这看似天真的社会习惯意义深远。库克认为，童年的商品化使得消费植根于整个生命进程，为消费文化提供了连续性，否则消费只是一些结构松散的买卖关系。他追问道，如果“面对现成的商业意义”，能动性和创造力继续占据优势，结果将如何？

安德烈亚·L. 普雷斯与布鲁斯·A. 威廉斯研究的是“真人秀”电视节目和他们所谓的“博彩名人”。在真人秀节目中，人们之所以出名，靠的是运气而非才智，靠的是个人的普通寻常而非特别的成就。当我们的成就只是局限于当下而无须传之后代时，将会发生什么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日常生活就是这些后，它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玛丽亚·基法拉斯的研究关注的是那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单身母亲是如何从她们的生活经验中获得意义的。那些妇女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机会的丧失、贫穷或绝望，而是把做母亲视为控制贫困混乱的城市生活的一种方式，视为积极进取包括接受教育、寻找工作的动力。她认为，由于阶级特权以未得到承认的方式构建了如何做母亲的观念，贫穷的单身母亲乃是因为她们所处的阶级而不是做母亲的方式才遭到诋毁的。

身份与差异问题不仅是文化社会学关注的中心,也是政治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社会学关注的中心。差异的表达常常与积极的集团身份相关,这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形式的团结将走向瓦解?我们如何理解身份范畴在个体与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流变及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具体体现?戴维·哈利与L.弗兰克·韦耶认为阶级分析仍有其重要性,只是意思稍有不同,且应把文化考虑进去。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实际上所处的是一个复杂且有时矛盾的阶级地位,受多种经济因素的决定,如股票的持有情况、妇女劳动力的参与、全球化的影响等。认识不到这种复杂性,就很难清楚地解读阶级文化。

米歇尔·狄龙的研究质疑的是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即认为肯定身份差异会削弱对更广泛的共同历史的信奉,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共同性的对立面。她发现,同性恋天主教徒一直在调和他们独特的性身份与教会信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地选择做天主教徒或做同性恋者。通过这种行为,他们抗议并改造的是天主教那些普遍主义的身份叙事。她的研究表明,传统是由多股力量构成的,能够容纳并沟通各种特殊的差异,传统本身能够肯定差异,差异并非对立于文化传统。

奥维尔·李在研究身份差异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法,他认为种族是“结构性的文化事物”,而不是社会制度或个体身份的永恒特征。既然种族不属于具体的个人或集团,而是一种社会文化逻辑,是种族范畴和意义对个体的强加,那么继续运用种族范畴以提出政治主张还有意义吗?在重新处理社会的种族不公正问题时,我们还需要种族范畴吗?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概念,我们是否是在对所批判的逻辑进行再生产呢?李认为:“废除种族思维将是社会从种族对抗解放出来的最基本的规范性前提。”

不同地位的社会行动者对文化与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统一的文化、历史观因此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集体记忆”呢?谁有权力塑造集体记忆,个体如何去处理他们与过去的关系?

巴里·施瓦茨、福冈和也与泷川石井幸子追问的是:为什么日本青少年认为他们要为他们的历史负责,而美国青少年则不然?尽管美国人认为,为过去的结果道歉是恰当的行为,而日本人却不然。面对那些对历史与纪念进行祛魅、认为它们是意识形态形式的理论,这些作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化是重要的特质和世界观,能够渗透到个体看待他们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的方式。

博物馆过去是文化权威机构,现在则成为博物馆专家、赞助人、展品主人及博物馆所服务的公众多方协商沟通的场所,为此简·马容泰特对博物馆性质的变化作了分析。博物馆不再是文化的仲裁人或最终的阐释者,它必须要面对不同集团对它们的物品或文化信息拥有权威的主张。有关文化权利、真实性和文化权威的观念不断变化,这不但影响了博物馆长对博物馆的决策,实际上也影响了博物馆的每一种实践活动(从处理和修复收藏品到展品目录的书写方式),并将公众作为活跃的力量吸引到共同的实践与价值的创造活动中来。

“我们怎样记住恐怖事件,又怎样忘记它?”在分析1980年博洛尼亚爆炸惨案及1969年米兰爆炸事件的纪念活动时,安娜·利莎·托塔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对恐怖事件的记忆需要建构适当的场所和记忆物,比如博洛尼亚火车站的纪念匾和当时用来运尸体的公共汽车。但使得博洛尼亚的记忆根本不同于米兰之遗忘的是活跃的